

后冯友兰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

成兆文*

20 世纪，中国哲学天空可谓群星灿烂，出现了一批有创造性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是其中杰出代表。按照中国哲学内在的发展逻辑，我们大体上可以认定，冯友兰是一位中国哲学研究的划界性人物，据此，可以把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划分为冯友兰时代和后冯友兰时代。

一

冯友兰无疑是中国哲学研究划界性的标志人物。这基于诸多理由：

第一，冯友兰是哲学范式在中国立身的缔造者之一。在传统的中国学术分类体系中，有经史子集，有义理考据辞章，但从来没有“哲学”一词，尽管后来有哲学史家把“义理之学”看作是哲学的内容，但毕竟作为明确学科的哲学是非常晚出的。日本近代翻译家西周以中国古代辞典《尔雅》为依据，把 philosophy 翻译成哲学，但在日本人那里，哲学是一个区别性概念，区别于传统中国的儒学等。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从日本引进了哲学，但长期得不到学术界承认。胡适在《中国古哲学史大纲》（上）中认为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问题”，这与哲学本义尚相去甚远。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则明确把哲学当做“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这更加切近哲学本义。如果说胡适等人开启了哲学在学术界的立身，冯友兰的则让“哲学”这一学术术语彻底获得了承认。从此，哲学被中国学术界普遍接受。

第二，冯友兰是最先对“中国哲学”具有学术自觉的人。最早写出《中国哲学史》的谢无量以及后来留学归来的胡适，都缺乏对“中国哲学”本身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相反，此一问题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中得到了充分重视。冯友兰明确把哲学和特定民族的特定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因而比较巧妙地解决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此一问题被参与评审的陈寅恪所敏锐注意到，并由此以哲学其他自然科学的区别为例，初步讨论了“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重大问题。2001 年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访问中国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其实质就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其滥觞可以追溯到冯友兰，其解决的学术视野也大体在冯友兰的学术框架内。

第三，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范式的建立者。虽然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建立也有开山之功，且其“截断众流”的办法获得了蔡元培先生等人的赞赏，但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更多具有传统考据学的功夫，以至于后人评价“有史无哲”，且胡适并没有完成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的撰写。以自己的哲学观从孔子讲到自己，一以贯之讲通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当属第一人。即冯友兰真正把哲学与历史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沿用至今的“中国哲学史”范式。

第四，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至今难以逾越的学术高峰。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不但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范式立下标杆，更是为以后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立下了标准。在近百年的中国哲学史教学体系中，尽管建国后有沿用三十多年的任继愈等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也有改革开放后萧萐父、李锦全以及北京大学编写的教材，包括后来各个高校哲学系各自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但其思想认知和学术影响力至今尚未超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第五，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最有构建自己哲学体系自觉的哲学家之一。冯友兰在治中国哲

* 成兆文，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学史时并不满足于做一位哲学史家，而是从哲学史中走出来，用自己的话说，是从“照着讲”走向“接着讲”。这种自觉性从他的治学伊始就很明显，无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还是《中国哲学简史》以及耄耋之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是从古讲到今，讲到自己，把自己的哲学理念贯穿到底。他明确要构建“新理学”，以儒家道统传人自居的哲学家自觉是很明显的。

第六，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在他所著“六书”中，几乎涵盖了人生的所有内容，构筑了体系庞大、内容丰富、逻辑自洽的哲学体系。也即冯友兰既是少数既有哲学家自觉、有哲学家能力的人，更是完成了哲学家事业的人，尤其其他综合中西方哲学，提出影响深远的“人生境界论”，至今闪烁着巨大的真理光芒，也是中国哲学给与世界的重要思想成果。与冯友兰处在同一时代富有思想原创性的中国哲学家还有熊十力、金岳霖、贺麟、梁漱溟、张岱年等人，但就“思史相荡”、“中外互释”而言，“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冯友兰无疑是杰出代表。

第七，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核心品质和概念有发明揭示之功。由于近代中国学术界的话语迁移，冯友兰无疑是站在中西方哲学对比的角度治中国哲学的，他的哲学观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新实在论，但意识到中国哲学的自我特质，由此他提出了中国哲学“负的方法”，并引发出自己独特的“人生境界论”，这是对中国哲学巨大的贡献。他对“名家”予以了高度重视，也阐明了程颢程颐兄弟之间的思想差异等。同时，他晚年在进行中外哲学比较的时候，从张载“仇必和而解”引申，特别强调了“和”之概念的重要性，并预言了和谐建设必将到来，也预言了“中国哲学定会大放光彩”的未来前景。同时，冯友兰又不是保守的学术民族主义者，他认为中西之别，更多是城乡差异，中国发展需要赶上西方，需要工业化这个环节而已，这都是深刻的洞见。

二

就哲学研究而言，目前我们正处在“后冯友兰时代”，即整体上处在冯友兰时代后期，面临中国哲学的世界化、未来化、中国化的任务。理由如次：

一是就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学术眼界而言，目前处在突破冯友兰时代的临界点。其中，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仍有待继续深入讨论，中国哲学自身的根本特征、表达方式、研究主题和主要范式在21世纪仍需要继续讨论，其核心在于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何继承冯友兰的哲学遗产，并结合时代精神和中国哲学自身的韵律进行哲学创新，使其不仅仅给21世纪的中国人必要的精神挂靠，也在更大尺度上涵纳世界发展的问题，无疑是需要直面的。

二是冯友兰其时秉承了新实在论的哲学观，在近代意义上理解哲学，这一问题越来越暴露出值得商榷的必要性。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成果是从“逻格斯中心”的理性霸权走出，看到非理性的力量，而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两个道路上，以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西方哲学概念自身的地形地表已经暴露，甚至许多如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认为“哲学实际上是古希腊人的发明”。整体上，作为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终结了”，寻求一种更具有道说能力的“大思”已经迫在眉睫。这对冯友兰时代人们理解的“中国哲学”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更高要求，甚至如何命名“中国哲学”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是中国哲学的自我表达亟需获得新的形式。在冯友兰时代那里，还有较明显的西方哲学的痕迹，尤其其他身处近代学术生态，中国现代汉语言尚在形成与成熟过程中，一种符合汉语内在表达的文本业已条件成熟。也就是，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被唤醒，寻找符合汉语自身表达的另一种“哲学”，其哲学观、研究主题、语言表达都能否更加符合汉语文化体系内部的韵律，是值得不懈探索的事情。人们越来越对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表达方式不满，但新的中国哲学样态是怎么样，值得期待和呼唤。

四是中国哲学世界化的问题。中国哲学面临的主题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哲学面临着

如何世界化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人自身的思想经验已然与世界融合到一起，中国哲学内在的逻辑推动力已经让位于世界。由此，中国哲学家在面对中国自身问题的时候，必须面向世界。亦即不可能仅仅从传统中国哲学系统中开出当今之中国哲学。从冯友兰晚年开始，尝试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重新尝试阐释中国哲学史，虽然其成果有许多商榷处，但显然他意识到必须重视一个更大的思想背景。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然变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也注入了中国哲学语境，中西马的融合汇通是大势所趋。

五是中国哲学未来化的问题。在冯友兰时代，中国哲学除过保持自身的节奏外，中国由于工业化的缺环导致与西方差异相当于城乡之差，但在那时工业化实际上是科学技术力量的早期显露。随着星际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已经把从原生大地连根拔起，现代人越来越被所谓“技术的座架”所控制，未来哲学面临的主题可能要将传统哲学家的的问题清零，重新回到更加原始的出发点，追问人是什么等问题。生物工程学、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5G 技术、量子通讯、高铁与飞机技术严重改变中国也改变世界，当传统的天地阴阳从经验层面被更大的眼界所解构的时候，中国哲学如何可能就成为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3. 孙彬：《论西周从 philosophy 到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4. 德里达：《德里达中国演讲录》，杜小真、张宁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5. 田文军：《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载于《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